

『国医之殇』

百年中医沉浮录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国文明历经裂变与再造，奔突和自守，号为『国医』以自尊、自强，却面临生死存亡艰难变局，中医之路，在于『返古』还是『维新』？
透过百年层层烟云，直指当下困局种种

郑洪 陆金国 著



广东出版集团

广东科技出版社（全国优秀出版社）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官方媒体

南方都市报

国家中医药行业唯一权威大报



重磅专栏

『國醫之殇』
百年中医沉浮录



郑洪 陆金国 著

■ 广东出版集团 广东科技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医”之殇：百年中医沉浮录 / 郑洪，陆金国著.
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0.6
ISBN 978-7-5359-5283-7

I. ①国… II. ①郑… ②陆… III. ①中医学-医学史-广东省 IV. ①R-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77255 号

责任编辑：吕 健

责任校对：C. X

封面设计：高 虎

责任印制：严建伟

出版发行：广东科技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邮码：510075)

E-mail: gdkjzbb@21cn.com

http: //www. gdstp. com. cn

经 销：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邮码：528225)

规 格：787mm×1 092mm 1/16 印张 14 字数 250 千

版 次：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如发现因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在今天国内的城乡，偶尔可见“国医堂”、“国药店”这样的名称。“国医”指中医，不过后者是法定名称，前者只是一种民间称谓。

其实在近代，曾真实有一个业界乃至部分官方机构通称中医为“国医”的阶段。然而那恰是中医遭遇极大危机，为生存而苦苦抗争的时期。

中国近代百年，狂澜突进、风雷激荡的社会与文化变革，给传统文化带来巨大的伤害。如果说革命是医治国弱民贫无法避免的虎狼重剂，“打倒孔家店”确实是破除封建、思想启蒙所必须的行动，然而，并不涉及思想政治、仅仅是民生日用的中医，却何以也屡屡成为新文化运动干将们的“靶子”？当时更有余云岫等人以“科学”作为武器，试图用卫生行政之力将“不科学”的中医一举消灭！

科学不能说不是好事，中国人真正感受“科技改变生活”，正是始于近代。但科学在社会生活中是否应该决定一切？对科学的理解，是否只有一种角度？胡适在1923年说：“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名词就是科学。”（《科学与人生观》序）这种“无上尊严”恰当吗？

对中医而言，谈论它科不科学，这本非理论争辩之事，而应从临床实际推求研究。事实上，中医正是凭借其临床疗效获得民众信仰，才得以在偏执尊奉“科学”的时代里坚强地生存了下来。可是，由于它“不科学”的身份，始终无法取得权力与知识界的认可，它试图借以抗击“旧医”贬称的“国医”尊号也终遭夭殇——民国时期的《国医条例草案》被改名为《中医条例》，从中央到各地的“国医馆”被限制职权无法发挥作用……当然，是否被称为“国医”，对中医而言并不重要。这只不过反映着政府对传统医学在认识与定位上的摇摆。作为一门应用科学，中医赢得尊严的关键在于实际效用。只是为了跟



上日渐进步的社会观念，适应日趋规范的行政法制，中医也需要变革，才能避免整体的夭殇。然而变革学术与维护传统如何兼顾，其尺度并不易把握。中医在近代百年跌宕多变的旋律中，跳着时进时退的华尔兹舞步，其间复杂的言论与争执、抗争与博弈的过程，便是本书所着墨的内容。

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初，我们在《南方都市报》的“历史”版以专栏形式连载了20期“近代广东中医沉浮录”，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此次结集出版，稍作增饰，改为今名。之所以称“国医之殇”，其实是以“国医”一名的前后变迁，借以为所描述的从中西医学汇通交流，到西医提出“废止旧医”、中医主张发展“国医”，以及两者最终在国家行政中逐渐定位的历史过程点题。

在内容上，本书部分篇章较多选择以广东为案例。广东在中国近代史上向来有着特殊地位，它是多次革命的发源地，地方政制大体与中央一致但特定时期又有其独立性。在医学方面，广东也有特殊性，它既是西方医学登陆和发展的初地，又是中医药特别深入群众生活和医药商业特别发达的地方。因而中西医在这里的交汇与撞击，特别能折射时代急流里中医的命运与境遇。中医的抗争风云，是近代文化变革中的重要事件，其实也是思考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实例。因此，本书虽例举广东其实顾及全国，虽言医其实又不止于医。

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迄今，中医与西医并存，仍是我国独特的医疗制度。中医如何与西医结合，仍是社会的热点。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潮也同样面临与现代社会的适应问题。很多问题往往需要回溯到其产生的环境，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寻求解决方案。因此，理性回顾近代“国医”之殇，对读者思考医学与国家、社会的关系，求解中医在当代社会的发展路向，或不无启示。

作者
2010年4月





序篇：“古今大变局”的开端 / 1

近代，是中国文明裂变与再造的时期。西风东渐之下，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著名中西汇通医家唐宗海所称的“古今大变局”中。在这个“变局”里，人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医学知识与思维的差异，更有社会整体环境改变下的适应与生存问题。

晚清中西医的汇通与论争 / 9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医学，在晚清突然遇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外来医学，会有怎样的反应呢？事实看来，冲突堪称剧烈。然而仔细想想，其间有多少是真正的医学讨论，又有多少是裹挟于时代大潮下的浮嚣之争？旧中国之落后，首先是制度的落后。这或许是论争伊始人们得出的最有价值的结论。

甲午之疫：广州不设防 / 17

光绪甲午，公元1894年，在广州发生了有10万人死亡的大瘟疫。没有专业医疗队伍和公共卫生政策的广州，就如同一座对瘟疫不设防的城市，仅靠个别医生英雄和道德志士，无法阻止它的沦陷。这场大疫，以惨酷的形式，再次向晚清政府提出了医事管理与公共卫生改良的问题。

卫生行政的起步：西医当朝，中医在野 / 25

由于传统政治缺乏医疗卫生方面的系统管理，中医本就算不上“在朝”，到近代因为西医开始占据卫生行政权力，却一下变成了“在野”。西医有卫生学方面的长处本来并不意味着全面的学术优势，但因为与行政权力的结合而影响力陡然



增大。再加上紧随其后医生执业和注册等权力顺势为当时立场并不客观的西医所掌握，中医就不免要面临一场劫难……

梁启超医疗事件与中医境遇 / 33

被西医误割右肾的梁启超，不肯追究西医院的责任，甚至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对“科学”的宽容。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情，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接受中医老友的治疗，却又说他“言涉虚沓”。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何以对西医与中医的态度反差这么大？

合群进化：中医社团意识的觉醒 / 41

如果说近代中西医的论争在学术上一直处于相持阶段，那么中医参与论争的形式则在不断更新。从最初陈定泰、朱沛文等汇通医家的个人研求，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出现结社、集会和创刊办报，中医在形式上逐渐走向近代化。这种变化，使中医在抗争政府卫生行政歧视时有了充分的力量。

1929：中医反击“废止旧医案” / 49

1929 年 2 月底，在满座西医的国民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上，一个“废止中医”的决议，在中医缺席的情况下赫然通过了，过程中甚至只有如何执行的讨论，而没有应否实行的争辩。消息传来，举国大哗。中医界、中药界、商业界纷纷参与到这场抗争中来。本就暗流涌动的“朝”“野”之争，就这样因为行政权力的不公正倾斜，终于摆上了台面……

缺席还是僭席？——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争议 / 57

国民政府教育部拒纳中医学校，使得中医被迫落入了“第 22 条军规”式的陷阱——申请医生资格的前提是拥有教育部立案学校的学历，而教育部从未批准过中医学校立案！缺乏法理上的合法地位，对中医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尽管中医界据理力争，但由于当政者根本无听无视，最后甚至连“学校”的名称都被打上了“非法”的烙印。中医争取教育权利的斗争，一时间陷入了僵局……



上医医国：中医教育自主转型 / 65

1924年9月15日，经过近10年艰苦筹备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上，木刻校训赫然：“上医医国，先觉觉民。”前句出自《国语》：“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后句出自《孟子》：“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在中医教育不被承认的当口，中医药界自主创办中医学学校，其所谓“医国”“觉民”，岂是仅指医学，难道没有警醒世人尤其是当局应当正确认识中医中药的用意吗？

“国医”时代（上）：名分攸关的“旧医”与“国医”之争 / 75

西医为了标榜自己的“先进”，自作主张地把中医称作“旧医”，这更让中医界抗议的声浪高涨，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国医”之称。以“国”字冠于中国事物，本非特例，然而以国文丰富、微妙的内涵来揣度，“国”字当头，隐隐就有了一种正统、主流的意味。随着1930年中央国医馆的正式建立，一个貌似给中医界带来新希望的“国医”时代来临了……

“国医”时代（中）：科学化路向的徬徨 / 83

通观国医“科学化”的各种主张，从积极方面说，它确实是国医馆得以成立和争取政府及社会支持的安身立命之本。但如何“科学化”，则是非常复杂的学术问题，不是单凭愿望能够达至的。事实证明，以国医馆为代表的中医改良者向“科学”的妥协，并未换来自命“科学”的西医的青眼，相反却失去了不少中医的支持。在把握学术发展方向上，中医改良者们陷入了徬徨之中……

“国医”时代（下）：关乎“国际体面”的《国医条例》之争 / 91

随着“中医”被确定为正式的官方名称，短暂的“国医”时代落幕了。在此段时期里，中医要求独立行政的主张也许有些不切实际，但毕竟改变了“卫生行政机关，竟无主管国医的职官”的局面。只是，未能争取到至关重要的合法教育权利，仍然说明，所谓“国医”带来的“尊崇”感，不过是虚假的幻象。它的意义，正像人们对中央国医馆、对“中医科学化”的期望一样，要打很大的折扣。



慈善施仁：中医服务的优秀传统 / 101

中医一向被称为“仁术”，在近代公共卫生机制尚不完善时，各地中医善堂在民间医疗救济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兴盛的中医慈善事业，体现了中医简、便、廉、验的优势，嘉惠贫病甚深。它弥补了政府医疗系统中中医缺失而百姓又看不起昂贵的西医的不足，同时也使中医更深入地在群众中扎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海外坚守：华侨中医的崎岖生存 / 111

近代以来，随着福建、广东几次“下南洋”的移民潮和旅居海外华人的日益增多，中医中药也因应这个人群的广泛需求，在海外扎下根来。然而，近代海外中医的困境，与国内也有颇多相似之处，往往不得不屈从于当地卫生行政的制约。随着医学观念的更新，现代社会已经越来越认识到中医药的独特价值，当代允许中医、针灸正规行医的国家和地区不断增多，中医教育也得以逐步开展……

中医考试：跛足的执业之路 / 121

在经过废医—抗争的斗争之后，政治层面上已经不能把中医排斥在卫生行政之外了，但由于中西医确实存在诸多观念差异，当此境遇，中医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画地为牢制造一个“纯中医”圈子就可以发扬光大吗？一种受限制的学问，必然不是完整的科学；而受限制的医生，也不可能是真正负责任的医生。明鉴乎此，近代中医拒绝在业务上再度“跛足”，一直在力争全面的行医权利。

中医医院：中西知识共存的空间 / 129

医院形制诞生于西方，它是以近现代的病菌理论、卫生知识和消毒技术作为基础的。而传统中医在气化式的病因理论下，比较缺乏近距离预防传染的技术手段。所以，中医若设立医院，就必不可少地要采用西式的卫生措施。所以说，中医医院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西医学知识共存的空间。这并不等于中医西化，而是在适应现代社会基础上发展中医的必须手段。



处方鉴定：司法中的中医话语 / 137

1930年代，中国社会改变的另一个表现，是市民权利意识大为增强，各种诉讼大为增多。其中有关医疗的纠纷案件也纷纷出现。对于中医来说，在医讼案件的处理中，就存在一个医疗鉴定权的问题，需要争取和解决，以避免西医当中医“裁判”的不公平处境。

南国“特区”：陈济棠主政下的广东中医 / 145

20世纪30年代，权倾一时的“南天王”陈济棠主政广东时，在发展教育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做了不少实事。此外，耽好传统文化的他，还对中医大力支持，创善堂、办学校、设医院等一系列措施，使得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广东成为一个中医的“特区”，更为今日广东中医的发展保有了颇具分量的一笔财富。

考验与转机：中医抗战赴国难 / 155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难当头，中医药界与全国人民一起，投入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然而，中医能胜任战争救护吗？事实证明，在“科学”之争暂时搁置、临床成效置于首位的这场考验中，中医药大放异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全面尊重。这也为中医赢得了苦争多年的“教育合法化”、“医院合法化”、“学术地位平等化”等一系列权益……

在敌后：沦陷区中医的生存和斗争 / 165

通常提到抗战，人们联想到的是血与火的壮烈。提起沦陷区，也只是想到敌后武工队的英勇。但不应忘记的是，在那里还有着广大被迫成为“顺民”的同胞，在沉默中等待曙光的来临。当时许多身处沦陷区的中医界人士，在服务民众的同时，更通过各种形式与敌人进行着无声的斗争……

唇齿相依：广东药业的近代荣衰 / 173

中医兴则中药荣，中医亡则中药衰，中医中药从来都唇齿相依。近现代西药业虽然也有一些药物从天然动植物中提取，促进了某些原材料品种的商贸，但远不如中药之品种丰富，产地广泛，及其对种养、加工、运输、制炼到销售等一系列产业链的带动。它是国计民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驰誉全



国的“南药”大省，广东药业与医业一直相得益彰，在近代成为中医争取合法权利和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

争锋：战后中医的参政之途 / 183

抗日战争胜利后，政局纷争不断。国民党拒绝真正的和平与民主，执意召开在其主导下的所谓“国民大会”。中医、西医为了争取各自的权利，不惜打破斯文，“以拳击桌，大声吆喝”。种种情况表明，此时的当政者对中医的态度仍是歧视有加，导致中西医界的对立有增无已……

国民政府要人与中医 / 1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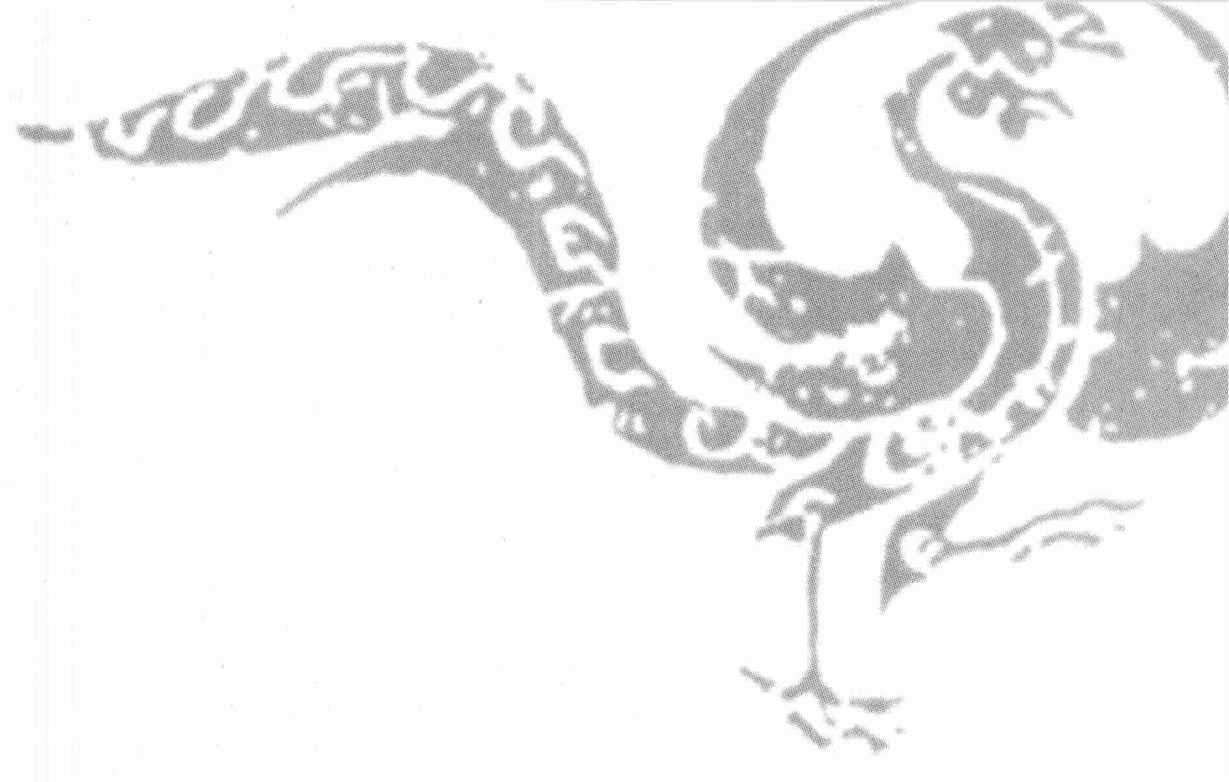
历史是由群众缔造的，但关键人物的一笔往往特别醒目。在中医的近代发展中，国民政府首脑要人们的态度堪可玩味。孙中山出于个人习惯不近中药，但最终还是受惠于中医治疗；汪精卫曾力主“根本废除国医国药”，但在亲见“岳母重病，西医束手，中医二剂而愈”的情况时，开始摇摆两端；蒋介石并不反对中医，但也不积极提倡，只是在关键时刻出来表个态，更多体现的是政治权谋……

求索：如何才是“新中医” / 201

近代百年，中西医的共存已成为社会事实。以大多数人的立场来看，中西医学各有所长，因此所谓要废止某一方的言论确属荒谬。但是那特定的情势中，却有许许多多的知识精英、社会要人纷纷卷入其中，一波波的冲击使得近代中医如此命途多舛，也使中医自我革新之路崎岖难行。与整个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境遇一样，时势根本没有给予思考空间，却必须尽快蜕变图存。此种情形下闯出来的“新中医”，精神风貌与进步意识虽然令人耳目一新，但也不得不留下诸多缺憾。

余音：相信未来 / 211

关于中医与现代社会，有许许多多的话题。在现代的知识体系里，中医显得相当“另类”，不断引发争议。这种“另类”的局面，正是开始于近代时期。中医之路，在于“复古”，还是在于“维新”？这是哪怕到现在，一代一代的中医人仍在苦苦思索的问题……



序篇：“古今大变局”的开端

近代，是中国文明裂变与再造的时期。西风东渐之下，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其他领域一样，不可避免地步入了著名中西汇通医家唐宗海所称的“古今大变局”中。在这个“变局”里，人们要面对的不仅是医学知识与思维的差异，更有社会整体环境改变下的适应与生存问题。



近代，是中国文明裂变与再造的时期。

虽然依通常的划分，“近代”只是从1840年起到1949年止的短短110年，在源远的历史长河中并不起眼，但其间，中国社会、思想和文化的改变之剧，远远超过此前的三四千年。在此，我们且不去细数这110年间的激荡政治风云，但我们必须认真审视文明的蜕变，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影响了中华文化发展的轨迹。

中西医学文明的汇聚

近代中国文明之变，有的属大破大立、发聋振聩之举，像废科举兴学堂、白话文运动、科学与玄学论战等等，轰动一时，堪称近代思想启蒙的标志性事件。有的则无声无息、潜移默化，像火车、轮船、报纸、照相、电影等新事物，开始不过是在“奇技淫巧”的批评声中零星出现，但一两代人之后就已成为时尚，甚至成为习惯。物质与技术对文明的影响力，比思想冲击更为持久，甚至更不可逆。

人类生活中，病痛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各个古老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医学，造福人类。中国的中医学在这方面尤为突出。因为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文明没有发生过大的断裂，中国人的生活环境没有发生大的改变，这对于中医学的发展极其有利——理论框架长期稳定，医学思想和医疗技术经受反复验证，有效医药经验可以不间断地累积增多。

广东僻处岭南，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原地区相距较远，在古代更因交通不便，文化开发较晚。中医药虽然在汉晋时期已有传入，但要到宋元之际才开始普及和发展。然而岭南炎热多病的环境，恰适合中医药大展身手，因而很快在民众中有了良好的基础。明清时期广东作为对外交流的重要口岸，商品流通，经济繁荣，医药商贸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也促进了医药知识的普及。清中晚期的广东已经成为传统医药业的重镇。

但是习惯了传统医学的中国人，与其他领域一样，在清末民国也开始面对一种完全不一样的医疗文化——近代西医学。处于对外开放前沿的广东首当其冲。

言“西医”，之所以要加以“近代”二字，那是因为西方医学有古代、近代（20世纪中期以来已发展成现代医学）之分。古代的西方医学，指以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为代表的传统西医，它在形态上与





古代中医、古代印度医学等只有内容上的不同而性质类似，都是以哲理性的医学理论为基础，统系着丰富的医疗技术与经验。而“近代西医”，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近代科学兴起的背景下形成的新式医学体系，它以观察和实验的科学方法为手段，分化出系统细致的基础与临床学科，以社会化的公共卫生观念介入国家行政等。这些对近代中国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新的医学体验。

贸易与宗教，是文化传播的两大推手。但前者逐利来去，缺乏恒久。例如在 1840 年之前，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外国来华贸易者中不乏西洋医生，但主要限于为外国人服务，缺乏在中国立足的意愿。唯一有影响的是将西方预防天花的牛痘法传入中国的东印度公司外科医生皮尔逊（Alexander Pearson, 1780—1874），他也主要是通过培训中国助手邱熹等来开展工作的。实质上，贸易并没有促进西方医学在中国广泛传播。

而宗教，则具有利他性和大众性，对文化的传播更为持久和坚韧。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们，在清代中后期怀着“拯救”中国人的想法，前来传播“真理与文明”。但是在接触中他们发现，基督教义与中国的信仰传统差别极大，要想深入接触中国人，最有效的方法是利用各种世俗的科学与技术。西方正在蓬勃发展的近代医学，令一向有关怀病苦传统的教士们多了一个有力的手段。近代西医学正式传入中国，早期正是附宗教之骥尾而来。

“以医传教”下的西医渗透

通过医学来促进基督教传播，是谓之“以医传教”，广东正是这一思想的发源地。

1834 年，一位拥有医学博士头衔的美国传教士彼得·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见图 1），受美国教团美部会的派遣来到广东。在当时，由于来华教士患病常常难以得到合适的治疗，伯驾传教之余在医学方面的使命本来是为其他教士服务。但是伯驾以自身的体会，发觉通过医疗或可更好地接近中国百姓，于是在 1935 年，他依靠一些外国人及十三行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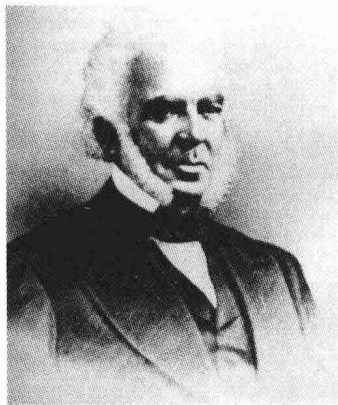


图 1 彼得·伯驾像



国商人的捐资，在广州开设了1间“眼科医局”，因其位处十三行内的新豆栏街，故又称“新豆栏医局”。

“眼科医局”开张之际，按伯驾记载，“第一天没有人前来”^{〔1〕}。不过，“至翌日则有一患眼疾妇人就诊，第三日则有六人，其后逐渐递增，至数月后，则每日开诊之时，来诊者户限为穿”^{〔2〕}。眼科医局3个月接诊患者925人，头1年共达到了2000人。

有鉴于伯驾通过医学接触中国人的成效，一位原来也曾是东印度公司医生的传教士郭雷枢（T. R. Colledge）在1935年撰文提出：“中国人经常表现出对世俗的或身体上的利益，比对任何旨在提升他们的道德和智慧状况的努力更有兴趣。”因而吁请教会“雇请开业医生作为传教士来华”^{〔3〕}。1838年2月，郭雷枢、伯驾等联合其他教士在广州成立了“中华医药传教会”，明确地提出“以医传教”的思想，提出要鼓励、帮助更多传教士医生来华，这样“他们的病人将不仅听说，而且还会亲身体会到，从西方来的人士是好人”^{〔4〕}，有利于吸引群众，方便传教。

作为“以医传教”的成果，广东在中国的西医发展史上取得了许多个第一：

第一间西医诊所——如果包括从明朝起被葡萄牙占据的澳门，则这里一直有零星的为外国人服务的西医，还包括基督教传教士来华早期也曾在澳门设立诊所。而公认为近代西医正式进入中国内地的标志，则是伯驾的“眼科医局”。它后来由另一个美国传教士医师嘉约翰（John Glasgow，1824—1901）主持，改名为“博济医院”（见图2），是在华历史最久的教会医院。



图2 博济医院是近代
历时最长的西医教会医院

〔1〕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1932: 178.

〔2〕 朱庆澜，梁鼎芬，邹鲁. 广东通志稿：第3册 [M]. 北京：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1：1099.

〔3〕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pamphlet, pressed by Chinese Repository, 1838: 23—24.

〔4〕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pamphlet, pressed by Chinese Repository, 1838: 11—21.





第一间西医学校——1866年嘉约翰在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校（又称博济医学校）。1904年该学校改称华南医学院，即中山医科大学前身。1886年孙中山曾在此就读。

第一本中文西医著作——《全体新论》（见图3），这是英国医学传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在广东南海人陈修堂的协助翻译下，于1851年出版的。书中对西方解剖学的详尽介绍，令中国知识分子耳目一新，大受震撼。



图3 近代最早的中文西医著作

第一种西医刊物——1868年嘉约翰编印《广州新报》，宣传医疗卫生知识，后停刊。1880年复刊，改名为《西医新报》。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西医杂志。

第一个西医留学生——黄宽（1829—1878），字绰卿，广东香山县东岸乡人。1847年赴美留学，在麻省曼松学校得文学学士学位，1850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科，获医学学位。1858年到广州，先后在惠爱医院、博济医局行医。据记载：“五十年来，凡欧米人之居留广州者，有疾无不归先生（指黄宽）治疗；所有兵舰，亦概以先生为医官。先生在，虽有欧米医，莫之任也。”^{〔1〕}可见其医术之高明。

.....

走进国人生活的西医

应该说，“以医传教”的策略效果是相当显著的。1840年《澳门新闻纸》载传教士描述，广东人“平常尽皆恨恶我等”，但“在我等各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2〕}。

〔1〕 陈垣。黄绰卿像题词 [J]。医学卫生报，1908（5）：2。

〔2〕 转引自中国史学会主编，鸦片战争（二）[M]。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491。



以伯驾为例，他的病人遍及广东社会各个阶层。他采用的一些手术治疗方法，对中国人来说是应该是颇为奇特的，然而经常接触外来事物的广东人并不惧怕。据伯驾记载：“很少有病人表现出不信任。一位 65 岁的回族妇女，双眼患有白内障。当我问她是否能忍受手术时，她回答说：‘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把它们取出，再把它们放进去。’”^[1] 时人还有诗称颂他的医术说：“治法迥与中国异，三分药石七分针。求医之人满庭宇，肩摩膝促犹鱼鳞。”^[2]

伯驾的病人中还包括了先后任两广总督的耆英、徐广缙等高官，甚至还有抗英名臣林则徐。据说林则徐由于患有疝气，曾托人向伯驾咨询，伯驾详细地为其解释此病的机理，还画了解剖图以说明，不过林则徐并未接见伯驾，只是派人取走了伯驾为其制作的疝气托。一些清代笔记记载，1850 年林则徐临终时三呼“星斗南”而歿，人多不解其意。张之洞到广东后，始悟其所说为“新豆栏”，“新豆栏，广东要地。公临歿连呼之，人讹为‘星斗南’”^[3]，在闽南话中这两者同音。有人由此猜测，他是不是在后悔未找“新豆栏医局”的伯驾看病？^[4]

伯驾的一个助手莫非·黛摩还记载，在他为一位官员的女儿阿思小姐成功地治疗了白内障后，惊讶地看到在这个“社会的苛刻戒律严禁女人和丈夫以外的任何男人接触”^[5] 的国度，阿思小姐竟然亲自前来医局向他道谢，并亲笔题诗在扇面上送给他。

据统计，至 1919 年，仅基督教新教各差会在广东开办的医院就有 39 所，病床达 2 722 张^[6]。西药店也陆续开张，如英国人办的屈臣氏药房于 1850 年在广州设立分店，日商森清太郎 1870 年在广州打

[1] Peter Parker.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 [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36, Vol IV (10): 472.

[2] 爱汉著.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M]. 北京：中华书局，1997：404.

[3] 王德乾等. 南皮县志 [M] 铅印本，1932；卷 14 “故实志下”之 43—44.

[4] 有关此事说法纷纭。一种说法称林则徐实际是被洋商暗害，因此临终时恨呼洋商所在地“新豆栏”；另有人认为他说的其实是神州话“心头疼”，均见来新夏《林则徐死因之谜》一文，见来新夏. 依然集 [M]. 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201—204. 独朱维铮先生认为林则徐之所以三呼“新豆栏”，是“念及十一年前曾经解除他宿疾的新豆栏医局”，见朱维铮. 走出中世纪二集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214.

[5] 老尼克. 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 [M]. 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40.

[6] 中华续行委员会调查特委会. 中华归主——中国基督教事业统计（1901—1920）[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359.

